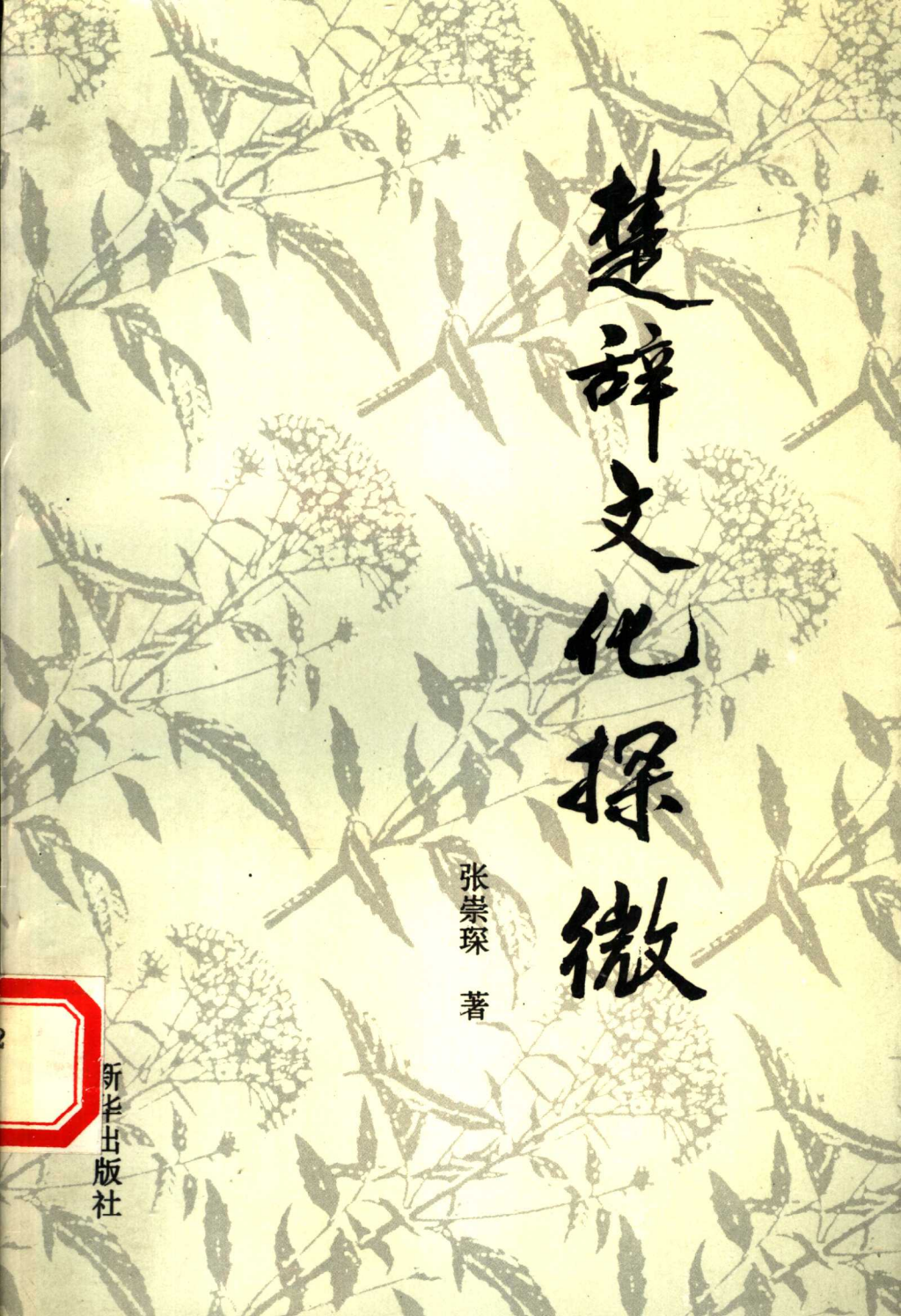




楚辞文化探微

张崇琛 著



新尚出版社

楚辞文化探微

张崇琛 著

新华出版社

自序

世之所谓“楚辞”，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指诗体，即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所创造的一种有别于《诗经》的新的诗体，世称“楚辞体”或“骚体”；二指一部诗歌集的名字，即最早由汉代刘向编辑成书的《楚辞》，主要收集屈原、宋玉及汉人有关“楚辞体”的作品。楚辞在汉代就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了。时至今日，有关楚辞的全部学问，学界多谓之“楚辞学”，或曰“屈原学”。而楚辞文化学便是这门古老学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楚辞》作为一部古老的诗集，目前已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楚辞》的出现，不但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已进入了文人自觉创作的时代，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同时，也为楚文化的研究保存了一块活化石，提供了一部袖珍本的百科全书。而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楚文化，又是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古希腊文化相媲美的。

自西汉刘安的《离骚传》以来，对《楚辞》进行评注和研究的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而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我始终牢记业师姜亮夫先生“要对楚辞作综合研究”的教导。犹记己未、庚申之际在“楚辞班”受业期间，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要真正做学问，一定还需要做综合性的研究，要综合许许多多的科目”，“要综合研究楚辞，因为研究楚辞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不单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也需要”。这些话都收在了先生的《楚辞今绎讲录》中，至今读来犹觉新鲜。先生还在给我所写的一段评语中，专门就综合研究的方

法作过阐述：“博涉群书是一个最主要的读书方法。专门只搞一、二门，自然容易为功，但成就必然有限。由博返约，然后能切实掌握所要掌握的东西，这即是近年来所盛传的综合研究方法的基本要素。”

余性也鲁。读书既少，而融通的能力更差，故常感愧对先生的教诲。然多年来，为配合教学，对与楚辞有关的书也大略读进一些，并围绕楚辞文化这个中心，尝试采用综合研究即多角度、多层次的方法陆续写出了一批文章。这其中的一部分，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楚辞文化探微》。应该说，此书半是师长的教诲和鼓励，又半是应个人教学之需的成果。

《楚辞》是很复杂的文化现象。楚辞文化的蕴含也是异常丰富的。关于楚辞文化的渊源、背景等方面的问题，已有不少学者作过研究。而我在本书中所要探讨的内容，虽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对楚辞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阐发。故而所采用的方法也是首先从作品本身出发，然后运用与楚辞相关的哲学、政治、教育、美学、文学、历史、地理、民俗、方言乃至植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保存于《楚辞》的丰富文化蕴含进行探讨和发掘。限于本人的学力，可以想见，这样的研究对我来说自然是很吃力的。但越是深入探寻，便越能令我感到楚辞之“道”的难穷，于是也就越能吸引我继续钻研下去，并因此而产生了乐趣。我至今记得，在我写作《楚辞之“兰”辨析》一篇时，当我从野外发现了兰草和泽兰的实物时，心情是何等的愉悦！现在这两株兰就贮在我窗台上的花盆里，每当夏秋季节，还时时散发着沁人的幽香。

本书主要是围绕楚辞文化而写，可以算一个整体。至其具体内容，又大致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对楚辞来源的探讨，我着眼于楚的固有文化和南北文化的交流，以及作家本身条件。二是关于屈原思想的清理与发明。屈原是楚辞体即“骚体”的创始人和代表

作家，研究楚辞，自然先要认识屈原。而屈原虽是以诗人名世，然又作过楚国的左徒和三闾大夫，并为南楚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故于屈原哲学、政治、教育、美学思想的研究应不可少。三是对楚辞代表作《离骚》的研究，或探讨其内部结构的特点，或探讨其象征手法的微义。四是从史、地的角度探讨楚辞文化的有关问题，“史”本《天问》旧闻，而“地”由《离骚》“神游”生发。五是对楚辞文化中的有关民俗现象及齐鲁方音的探讨。六是对楚辞植物文化的研究。最后一篇谈清人刘梦鹏的《屈子章句》。刘书在清人的楚辞注本中是很有特色的，然传布未广，难得一睹，故很有介绍的必要。以上虽非我研究楚辞的全部，但多少能反映一些我在楚辞研究方面的情况。其中有些论题，我也很想说出一些别人未曾说过的话来，然而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况且，楚辞文化本是一个大的课题，而我所研究的，充其量也不过是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一点枝叶而已。

本书中的大部分篇什，在给研究生和本科生讲课中曾使用过，有些也曾发表。此次成书，又经重新修订，并补写了一些新的篇章。但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当之处一定难免，敬祈方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业师姜亮夫先生在病榻之上，还时时关心我的学习和写作，令我终生难忘！及门诸君，如王亚林、周绚隆、姜楠，利用业余时间为我拙稿进行誊抄，也应在此一志。

张崇琛

1993年9月1日

于兰州大学

目 录

自序.....	(1)
楚辞的来源.....	(1)
屈原的哲学思想	
——屈原思想研究之一	(14)
屈原的政治思想	
——屈原思想研究之二	(29)
屈原的教育思想	
——屈原思想研究之三	(42)
屈原的美学思想	
——屈原思想研究之四	(49)
《离骚》结构探微	(65)
附：《离骚》译文.....	(87)
博大、和谐、深邃、持久	
——《离骚》象征探微.....	(106)
《天问》中所见之殷先王事迹.....	(119)
屈原神游西北的地理问题.....	(129)
楚辞齐鲁方音证诂.....	(139)

楚人卜俗考

- 楚辞民俗研究之一…………… (149)

说“娉女”

- 楚辞民俗研究之二…………… (166)

龙子节·卫生节·屈原节

- 楚辞民俗研究之三…………… (175)

楚辞之“兰”辨析

- 楚辞植物文化研究之一…………… (181)

楚骚咏“兰”之文化意蕴探微

- 楚辞植物文化研究之二…………… (193)

说“蒲剑”

- 楚辞植物文化研究之三…………… (203)

一个值得重视的《楚辞》注本

- 读清人刘梦鹏《屈子章句》…………… (210)

楚辞的来源

“楚辞”之名，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最早出现在《史记》中。《史记·酷吏列传》云：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

又，《汉书·朱买臣传》亦云：

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

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人，可见，武帝时“楚辞”已成为一种可与《春秋》相提并论的学问了。到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人有关“楚辞体”的作品，再加上他自己的《九叹》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至此，“楚辞”便不仅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也是一部诗歌集的名字了。后来，东汉的王逸又为《楚辞》作注，并增入自己所写的《九思》一篇，遂成为今天所流传的《楚辞章句》的本子。

那么，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和文化现象，它是如何产生的呢？简单地讲，它是楚国的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接触后所酝酿而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南北方文化交流而迸发出来的火花；同时，也是与

其代表作家屈原自身的条件及努力是分不开的。具体说：

一、楚国的地方文化是楚辞 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楚之先，出自古帝颛顼，即所谓“帝高阳之苗裔”。周文王时，其祖先鬻熊曾“子事”周王朝；至成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便被封于江汉之间，姓芈氏，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东），遂建国。那时的江汉流域，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处女地，楚人“筮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左传·昭公十二年》），开发了富饶的南方。此后，楚人在长期独立发展的过程中，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方文化。而这种地方文化对楚辞的形成又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楚人勤劳勇敢、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力争上游、反抗外侮的传统，是楚辞产生的思想基础。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书的话说：

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以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筮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正是由于楚人的这种奋发精神和辛勤劳动，长期以来，楚地远较中原各国为富足。《史记·货殖列传》说楚地“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在“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北方各国是不多见的。即使是

极端动乱的战国年代，楚的长江两岸仍有“平乐”的“州土”（《哀郢》）。像孟轲所说的“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的情形，楚国还未出现过。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屈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故土、对故国的强烈的爱，实在是有其根源的。

但是，尽管楚国有着自己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还是被北方各国目为“披发左衽”的“荆蛮”（《国语·郑语》），被看作是不开化的“鴃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不仅不能列于上国之林，而且在“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鲁颂·閟宫》）的口号下，始终成为中原各国征讨的对象。也正因为楚国处在这样一个被侮辱、被攻伐的地位，所以又培养了楚国人民一种誓死抵抗外侮和力争上游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楚辞》作品中，那就是“首身离兮心不怨”（《国殇》）的英雄气概和对于“国富强而法立”（《惜往日》）美好理想的向往。可见，楚辞尤其是屈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实与南楚特殊的社会及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

2. 楚地的民歌对楚辞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诗经》无“楚风”，但“二南”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境内，可以算是楚地的民歌。其它散篇单什，杂见古籍中的，尚有一些，如刘向《说苑·至公》所载的《子文歌》：

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说苑·正谏》所载的《楚人歌》：

薪乎，菜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

策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人乎！

按子文于楚成王时为令尹，成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672——前 625 年，则《子文歌》的产生时代总不出这几十年中。诸御己，据游国恩先生说，或即《史记·楚世家》之伍举（《楚辞概论》），而伍举谏楚庄王事在庄王三年，那么《楚人歌》的产生也可能在庄王初年，即公元前 611 年前后。这两首诗歌是现存楚民歌中最早的，虽极其质朴、单调，但在楚国，可算是楚辞不祧的远祖。稍后于此的是《说苑·善说》所载的《越人歌》，那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叶鄂君子皙（楚康王弟）泛舟时听越人唱的，子皙不懂越语，由“越译”翻译出来是：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楚、越在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首《越人歌》也远较前面两首为华丽，已经与《九歌》中的一些篇章十分接近了。此外，还可以看作是楚地民歌的，尚有《新序·节士》所载的《徐人歌》：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论语·微子》所载的《接舆歌》）：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尔。

《孟子·离娄》所载的《孺子歌》(又名《沧浪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左传·哀公十三年》所载申叔仪的《乞粮歌》:

佩玉蕊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

《徐人歌》的时间大约与《越人歌》同时。《接輿歌》的时间据《史记·孔子世家》说“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即公元前489年。《孺子歌》是孔子在楚时听来的童谣,也可定为与《接輿歌》同时。《乞粮歌》的时间明确,鲁哀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82年。

从上面所引,我们约略可以看出自春秋中期到春秋末期近两百年间楚国民歌创作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尽管只是残存的一鳞半爪,但至少能够说明,这些民歌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形式上,都与《诗经》所记录的北方民歌大不相同,而与后来的楚辞相近。尤其是稍后的几首,楚辞的主要形式,如隔句末尾用“兮”字的特点已经开始具备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楚辞就是在这些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 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左传·襄公十八年》云: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所谓“北风”，即是中原音乐；所谓“南风”，即楚地的音乐，亦即钟仪在晋鼓琴时操的“南音”。而南音之始，甚至还可以追溯得更早。《吕氏春秋·音初》云：

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高诱注：“取涂山氏女南音以为乐歌。”）

周公及召公是否取《候人歌》的音乐以为《周南》、《召南》不得而知，但“二南”中夹杂了楚人的风谣及音乐则是可以肯定的（见魏源《诗古微·二南义例篇下》）。可见，楚国的地方音乐也是源远流长的。

到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地方音乐更为发达。《招魂》说：

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阳荷些。

据《文选》李善注，“阳荷”当作“阳阿”，而《阳阿》与《涉江》、《采菱》均楚国歌曲名。又《大招》“伏羲驾辩，楚劳商只”的“劳商”和“辩驾”，据王逸《楚辞章句》说也是楚歌曲名。这些歌曲的具体内容我们虽无从得悉，但既然为楚辞作家所标榜，想来一定是当时楚国民间最为流行的新声了。此外，象宋玉《对楚王问》中所列举的《下里巴人》、《阳阿薤露》及《阳春白雪》等，也都是歌曲名无疑。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学与音乐还未完全分开，唱出来的是“楚声”，写出来的便是“楚辞”；而千变万化的“楚声”，孕育出来的必然是丰富多采的“楚辞”。

4. 楚国巫风的盛行，更是楚辞形成的极好的民俗条件。荆楚民

俗，最信巫鬼。《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郊祀志》记谷永说成帝云：“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奉军，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桓谭《新论》（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十三）还记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事上帝，礼群神，躬执羽拔起舞坛前”，甚至吴人来攻仍鼓舞自若，不肯发兵拒敌，说什么“寡人方祭上帝，礼神明，当蒙福祐焉”，结果太子后姬都当了俘虏。可见楚国上下巫风之盛。而楚国的巫风为什么会如此之盛呢？郭沫若先生说楚文化是殷文化的“嫡传”，殷人最崇信鬼神，故楚人亦保留其风俗（《屈原研究》）。实际上，楚文化的自成系统，不必待殷人之南下传播，这已为近来的许多地下发掘所证明。而楚地巫风的盛行实有其自身的原因。《国语·楚语》云：“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在古人认为，巫覡是神明的代表，能通神人两界的意思。为了祈福祐而免灾祸，便常常使巫覡作歌乐鼓舞以娱诸神。这种迷信的风气，古代各民族中都是有过的。楚地较北方开发为晚，其社会中保留氏族时代的遗俗也就较多，故当周人已“敬鬼神而远之”的时候，楚人却还在那里“隆祭祀，事鬼神”，原是毫无足怪的。

那末，巫风对于楚辞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祭祀必有祈祷，祈祷必用祝辞和歌舞。祝辞是为自己祈福的，即《伊耆氏蜡辞》（《礼记·郊特牲》）及《禋田者祝》（《史记·滑稽列传》）一类的文字，可以说与楚辞的关系不大。而用来娱神的歌舞则不同。歌必有辞，歌和舞也都须有曲，这样，巫歌、音乐便随之发展起来，而楚辞也就产生了。《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歌曲。至于《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等，也都是楚辞受巫风影响的明显的例证。

5. 楚方言对楚辞形成的影响。《楚辞》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故其中方言极多。如“扈”（披）、“汨”（疾行）、“凭”（满）、“羌”（语词）“侘傺”（失志貌）、“婵媛”（喘息貌）、“娃”（美）、“些”（suō）、“蹇”（语词）等便是。还有楚辞中常用的“兮”字，虽不是楚国方言，但它在南在北，同样是民间的口语，正如今天的“啊”一样。这些楚地的方言，既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大抵西汉以前研究楚辞的人们，多半懂得它的音调，汉宣帝时九江（安徽寿县）被公就能“诵读”楚辞（《汉书·王褒传》）。至隋代，僧智騫（据姜亮夫《智騫〈楚辞音〉跋》，道騫应为智騫）亦“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隋书·经籍志》），可见懂得《楚辞》中楚声的人隋唐间也还有。此后便不甚了然了。不过可以想见，带有浓厚方言色彩的“楚辞”，再以方音朗读起来，肯定是别有风味的。

6. 楚国的地理环境跟楚辞的形成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

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此说虽不尽然，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大抵北土环境艰苦，碌碌一世，逃生且不易，又安得闲暇以乐其风土？南方气候温暖，地沃物丰，求生至易，故居人常有闲情逸致，兼以其地之山清水秀，湖光潋艳，更易启幻想之思。正如刘勰所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物色》）可见，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自然环境也是分不开的。

总之，楚国的地方文化及其社会风俗、自然环境实是楚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在探讨楚辞来源的时候，首先应该注意这一点。

二、大量吸收中原文化是楚辞 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北方文化的传到南方，最早当推舜征三苗。三苗故地的江淮、荆楚（见《史记·五帝本纪》），正是后来周成王封熊绎的楚国。其时楚王族虽未入主，但舜的长征对那儿的土著肯定是留有影响的。其次是周公和孔子的入楚，也对那儿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产生过影响。而自春秋以来，楚的国势日益强大，先后吞灭四十五国，即所谓“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史记·楚世家》），“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至楚庄王时，楚更曾一度称霸中原，观兵问鼎，声威赫赫。这样，随着姬姓国家的被并入楚版图，以及楚与中原交往的日益频繁，南北文化的交流也便加强了。北方的学者们纷纷到南方去游说、仕宦，如鲁人墨翟曾说楚王，卫人吴起曾相楚悼王，魏人张仪曾以合纵说楚，赵人荀卿曾仕楚为兰陵令。而楚人环渊则成了齐国的稷下先生，楚人陈良“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孟子·滕文公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诸夏对南楚的歧视一直存在，但楚人对北方文化的吸收却是不遗余力的。楚国的大臣申叔时甚至还主张用北方的经典著作《春秋》、《诗》、《礼》、《乐》来教傅楚太子。《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的话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

这些建议的被采纳与否虽未可知，但楚人对北方文化的重视态度和积极吸取精神却是显见的。而且，我们从《左传》中还可以看出，楚国君臣上下，不少人都能引用《诗经》来谈话。如：

文公十年，子舟引《大雅·丞民》：“刚亦不吐，柔亦不茹。”
宣公十二年，孙叔引《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成公二年，子重引《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昭公三年，楚子享郑伯，赋《吉日》。

昭公七年，芊尹无字引《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昭公二十四年，沈尹戌引《大雅·桑柔》：“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这说明北方文化不仅已经传播到了南楚，而且已开始为楚人所用了。

至于屈赋中所提到的许多北方传说和史实，也有不少与《诗》、《书》及《左传》相同或相似。如“鲧禹治水”，既见于《天问》，又见于《尚书》；“夏初之乱”，既见于《离骚》、《天问》，又见于《左传》；“舜娶二妃”，既见于《天问》、《九歌》，又见于《尚书》、《孟子》；伊尹、傅说、